

# 禁書·盜印·避禍 ——《圍城》之外

• 蕭曉克

《圍城》在中國大陸「銷聲匿迹」三十餘年後，1980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重印出版。作者錢鍾書為此特寫〈重印前記〉一篇。這篇〈前記〉的頭三句話是這樣說的：「《圍城》1947年在上海初版，1948年再版，1949年三版，以後國內沒有重印過。偶然碰見它的新版，那都是香港的「盜印」本。沒有看到台灣的「盜印」本，據說在那裏它是禁書。」在這裏，作者沒有感慨，沒有嘆息，全據事實，在似乎平而又淡的敘述之間，就將《圍城》1949年前後截然不同的「遭遇」點得一清二楚，所謂事實勝於雄辯。顯然，這平淡的敘述中，蘊含着豐富的「潛台詞」。

1980年之前的三十年，大陸、台灣這兩塊由中國人自己管理的土地都不曾出版《圍城》，這是不爭的事實：倒是恰恰香港這塊非中國人管理的殖民地有「盜印」本出版行世！姑且不說這對海峽兩岸的中國人是不是一種諷刺，但這至少說明三十年間在大陸、台灣沒有面世的《圍城》在香港不是禁

書。至於這段時間中《圍城》在大陸、台灣是不是禁書，這卻頗難斷然言之，恐怕該作點具體分析。就台灣所言，《圍城》是否上過台灣當局的「禁書目錄」，限於目前兩岸交往的隔膜，這方面的第一手材料無法見到（即使在台灣，當局當年的「禁書目錄」之類的材料也不見得都已曝光），所以，錢鍾書也只用了「據說」二字，這是他的嚴謹處。但台灣三十年沒有出版《圍城》這一事實，卻可以讓我們依據《圍城》的內容作一種或然的估計：作者錢鍾書在《圍城》最早的單行本（1947年「晨光文學叢書」版）「序」中，將抗戰勝利後國民黨高唱的「還政於民」比之於「魔術家玩的飛刀」，是「語言幻成的空花泡影」，對當局玩弄的「憲政」把戲進行了無情的挖苦嘲諷；小說有關三閩大學內容的描寫，更是嚴厲無情地抨擊了抗戰年代國統區高等教育界的黑暗腐朽（這成為整個國統區社會黑暗腐朽的一個縮影）。這些，都可以成為三十年間台灣當局禁

《圍城》的原因。而當年「國民政府」風雨飄搖之際，錢鍾書拒絕了「黨國」的特別「關懷」（安排去台灣），留在了大陸，也可作為這一原因的再一有力補充。

至於大陸三十年間不出版《圍城》，情況恐怕就複雜得多，未易輕下判斷。有的人將原因追溯到了共產黨建國以前的1948年2月至7月間在上海、香港發生的「橫眉社」、「螞蟻社」圍攻《圍城》的事件。在這些圍攻文章中，有的無視《圍城》〈序〉和正文中對國民黨當局的嚴厲抨擊，硬說作者不關心時政，「儼然是個造物主」，「冷漠、超然」；更有甚者，竟將幾乎「不為艷詞」的《圍城》說成「是一幅有美皆臻無美不備的春宮畫，是一劑外包糖衣內含毒素的滋陰補腎丸」（參見《同代人》1948年4月20日第一卷第一期張羽的文章〈從《圍城》看錢鍾書〉：《小說月刊》1948年7月1日第一卷第一期無咎的文章〈讀《圍城》〉）！鑒於寫這些攻擊文章的某些作者有着共產黨員的政治身分，有人便認為這場圍攻是共產黨地下組織領導指揮的。但是，沈鵬年在他的〈《圍城》引起的回憶〉（《讀書》1981年第7期）一文中否定了這種說法。沈鵬年認為，那次的圍攻《圍城》事件與共產黨的組織領導無關（他舉出了地下黨上海市委負責人劉長勝、馬純古來作證），而是個別思想「左」傾的文藝工作者不問國情，生搬硬套蘇聯「清算文藝」（此詞見於沈的原文）的結果。更有趣的是，沈鵬年居然在他的文章中還舉出了相反的例子，說《圍城》在解放初期曾被中共上海滬西區委辦的各工廠企業高級職員「職員學習班」上列為學員的輔助參考讀物，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「起過積極作用」（這恐怕就連作者錢

鍾書本人也要大出意外了，套句錢先生自己說過的話，「這真是人生的諷刺！」因為錢先生本人就是這次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」中的改造對象。錢夫人楊絳1988年出版的小說《洗澡》就是一部藝術地描繪這場運動的經典之作，可以參閱）。

如果沈鵬年的說法不謬，那為甚麼此後三十年《圍城》在大陸又不獲出版呢？敏澤在〈現代文學史上的一部藝術傑作〉（載《新文學論叢》1981年第1期）一文中對此有所探討。他認為，三十年來沒出版《圍城》主要在於我國的文藝政策「忽略了對於我國新文學史上一切優秀遺產的繼承」，他還說，「隨着以後我們政治生活中『左』的思想和傾向的發展，對待知識分子總的來說越來越『左』，全國解放後的三十多年間，『五四』以後的現代名著雖然出版過一些，但唯獨《圍城》在中國大地上彷彿一直不存在似的。」敏澤這裏談到的文藝政策的偏差、尤其「左」毒危害使得《圍城》三十年間不獲出版，無疑是有其強有力的根據的；但這也仍不能說就是問題的全部。文藝路線和政策上「左」的影響雖然在時間和壓力上的確表現了相當的長度和強度，但也並不是說其間就不存在一些寬鬆或略為寬鬆的間隔的。「反右」之前1955年、1956年，「困難時期」過後的1962年、1963年等，都是相對寬鬆的時期。而這種相對寬鬆時期的實際存在，就要求我們在客觀環境因素之處還得從《圍城》作者錢鍾書主觀方面也作些考察。

首先可以給我們以啟示的一個材料是，1957年春，正值「大鳴大放」高潮，錢鍾書因父病由京赴鄂探省，路上寫了〈赴鄂道中〉五首絕句。值得注意的一首為：「駐車清曠小徘徊，隱

隱遙空碾薄雷。脫葉猶飛風不定，啼鳩忽噤雨將來。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另一首的後一聯：「如膜妄心應褪淨，夜來無夢過邯鄲。」這個正當47歲盛年的博學鴻儒，空有一腔才情、滿腹智慧、盈胸機趣，無論在創作還是在學術領域都無法盡情一展鴻圖。更何況他此時已有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」的經歷堪為前車：他不像當時許多大知識分子那樣健忘而頭腦發熱，響應「號召」去「鳴放」，相反，他倒是在這「放」的高潮之際，聽到了滾碾在九天之上的暴風雨（反右）來臨前的隱隱雷鳴！因此，他警醒自己：褪淨妄心，勿做美夢——哪怕是到了「千古盧生夢」的邯鄲！由此，我們可以看到錢鍾書內心浸透着悲涼的那份謹慎。他的「妄心」和「夢」，無非關乎學術和創作，而他在這兩方面都有着第一流的造詣和才華，這有他那之前已行世多年的《談藝錄》和《圍城》可以為證。但到此時，《談藝錄》和《圍城》畢竟都已絕版八年，這八年是他學術上和創作上都默默無聞的八年：面對即將來臨的大風暴（反右），他不僅打算繼續甘於默默無聞，甚至意識深處的「妄心」和「夢」也要褪淨以至於無了，這幾乎可以說是到了心如止水的地步！

李健吾在〈重讀《圍城》〉（載《文藝報》1981年第3期）一文裏有這樣的話：「我知道適夷同志為印這部小說（《圍城》）就游說過作者好幾趟，他都迴避了。為甚麼要迴避呢？我們住在一個大樓，我從來也避而不談此事。我心裏想，沒有領導關照，私下裏留念過去，作為一個「新」（應當是「舊」）知識分子，惶惶然於改造還來不及，十年浩劫又成了「臭老九」，誰肯冒這場無情風險呢？看批鬥時，這種迴避便成了好事。」從李健吾的這段話來看，

1949年以後，在外部客觀條件容許的時候（即樓適夷那好幾趟游說的時候），錢鍾書自己對重印《圍城》卻長期採取了迴避的態度，這顯然是帶着幾分「避禍」味道的。政治氣候隨時可以變化，而這種變化一旦發生，天降之禍首先便要落在無權無位的一介書生們的頭上。即使像「文化大革命」這種針對大大小小當權派而來的「史無前例」的政治大風暴，知識分子還是被首先拿來開刀祭旗的。「文化大革命」中，錢鍾書的「反動學術權威」的帽子上沒有多添一筆《圍城》的「污漬」，應該說是得益於錢鍾書先前「避禍」心態的先見之明的。關於錢鍾書的這種避禍意識，我們還可以找到別的旁證：柯靈在〈促膝閒話鍾書君〉（載《讀書》1989年第3期）一文中說：「我曾問他，這兩部學術性著作（指《談藝錄》、《管錐編》）為甚麼用文言寫作？他回答說：因為都是在難以保存的時代寫的……」《談藝錄》主要寫於日寇鐵蹄下的上海，《管錐編》則主要寫於文革前和文革中；這兩部著作使用了一般人難以接近的文言，儘管主要是為了使著作保存下來，但毫無疑問也還包含着作者不想因言獲罪的意圖，也即所謂「避禍」。學術著作尚且如此，那對純白話的《圍城》的重印，鍾書先生一直迴避，其「避禍」成分恐怕比前者就要更大些了。

其實，錢鍾書在他玉樹臨風的青春年華是頗喜歡口若懸河、滔滔不絕地隨意縱談古今、臧否人物、品評世態的，「痴氣」旺盛的時候，往往還愛「胡說亂道」（參見楊絳〈寫《圍城》的錢鍾書〉，吳忠匡〈記錢鍾書先生〉）：其父親子泉老先生正是鑒於此，才將他的字「哲良」改成了「默存」。但在1949年以前，他在這點上是並不怎麼遂其

父親大人的意的。1949年以後，經歷了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」，尤其經歷了「反右」前後那段歷史風波的起伏，他才真正「默存」了。錢鍾書有關「學問」的一段話，可說是極妙的夫子自道：「大抵學問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。朝市之顯學必成俗學。」可以說，1949年以後錢鍾書盡棄創作之途而全歸學問之山，便是着意要做一個荒江野老屋中的素心人了。錢鍾書贈舒展的詩中有一句「落索身名免謗增」；而當談到中國特定年代裏知識分子「福兮、禍兮」的關係時，他更對這幾十年中某些先是風頭出盡，後是霉頭倒足的文化界人士的政治命運概而言之曰：「你受到的待遇適與你出的風頭相稱。」（見美國胡志德著《錢鍾書》第一章）這都可以作為那三十年裏錢鍾書「迴避」重印《圍城》的主觀上的避禍意識的注腳。

人民文學出版社在1980年重印《圍城》時，似乎只是更多地考慮到範圍有限的現代文學研究者、大學中文系學生，或一些圖書館的館藏需要（因為錢鍾書在〈重印前記〉中有這樣的話：「人民文學出版社建議重新排印，以便原著在國內較易找着」）。當時，對重印《圍城》握有批准權的有關方面也許絕對想不到，現在，僅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平裝本《圍城》就已達到第七次印刷（1991年9月）的59萬冊的印數！以上印數還沒算1991年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匯校本《圍城》的印數（含精、平裝兩種），更不算北京、上海、武漢等地那些層出不窮的非法盜印本的印數。據《新華文摘》1991年第九期〈中國版權問題透視〉一文披露，北京、武漢、河北、河南、四川、內蒙、廣東等地均有盜印本《圍城》行世，種類達七、八種之多。其實這個

統計遠不完全。筆者1991年下半年在上海就看見多家書攤、書亭大量傾銷盜印本《圍城》，1992年3月在長沙則看見了最新的一種盜印本上市。從以上引證看來，如果把合法、非法出版印刷都算在內，《圍城》的總印數估計早逾百萬！就此而言，某些文化人所說「當今嚴肅文學不景氣」，也並不是沒有例外的；這也恐怕是錢鍾書1980年為《圍城》寫〈重印前記〉言及香港的「盜印」時所始料不及的吧！

錢鍾書34歲寫《圍城》，40歲時《圍城》絕版，70歲時他又為《圍城》的重印寫〈前記〉。從某種意義上來說，一部《圍城》的寫作、出版、絕版、重印的過程，便揭示了作者大半生的經歷，包含了數十年說不盡、道不完的政治、文化的風風雨雨……。這就難怪對世事從來淡然處之的錢鍾書先生，在1980年《圍城》重印時，也禁不住發出了「我感到意外和忻幸」的慨嘆。正值盛年便已作了褪淨「妄心」和「夢」決斷的錢鍾書，在自己年逾古稀，幡然一叟的「落花時節」卻偏偏看見自己的《圍城》硬是從沉潛了三十多年的時間之水裏又浮了上來，他怎能不「意外」，又怎能不「忻幸」呢！

不讓那段令人傷感的歷史再次發生，我們每個人都可以盡自己的一份責任。這正是上述《圍城》及其作者這幾十年際遇所給我們的啟示！

蕭曉克 1957年出生於湖南。1982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。曾任教於廣西教育學院中文系，現為湖南省郴州師專中文系講師。